

Opinion

■上观观察家

为何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

通货膨胀的最大危害是,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大范围转移,而且严重影响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能力。因此,在推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防”将成为优先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曹建海

12月3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会议将制定明年经济政策框架。考虑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国内社会各经济主体及中外机构利益的日益分化,特别是这次会议对于明年我国投资、消费、进出口、物价、股市、房地产等方面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可以预见,这将是一次举世瞩目的会议。

关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11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当前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不少有利条件,但同时指出,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国际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改善民生工作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要坚持稳中

求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协调发展,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就是说,在推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防”将成为优先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为什么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经济发展速度再快些,把“蛋糕”做得更大一些,不是我们一直所希望的吗?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一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由什么引擎拉动的?二是这种经济发展究竟能够给人民带来多少实惠?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当然,并不排除在特定时期,以重工业部门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迅速增长,以及在出口换汇时期扩大出口,也能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不过,固定资产投资一般是建立在消费需求基础上的。而且,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明,重化工业超前增长,也只存在于工业化过程的特殊阶段,并不能覆盖各个经济发展时期。出口创汇的目的,从来不应该为创汇而创汇,而是为了进口国内需要的多样化产品和服务。当然,依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进出口活动可以为一国带来额外的福利。这些理论和实践证明,投资和出口创汇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本国人民的消费水平;相反,如果过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过多的创汇,是建立在损害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各级决策者心态膨胀和经济泡沫基础上的,并最终损害了本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这样的投资和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就失去了其最基本的意义。

需要高度警觉的是,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实际上,我国目前包括建筑、钢铁、有色金属、水泥、航运等产业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住房投资、工业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为服务对象的。对房地产业的扶持政策,为从事该行业的各个经济主体提供了丰厚

的回报,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超过一半财政收入实惠。但是,这些成绩是建立在高房价基础上的,引发民众对高房价和房地产业诸多问题的不满。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把社会资源主要配置在房地产业的政策,不仅危害到我国的耕地资源保护,也深深地挤压了其他产业以及关系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科技的发展空间。

通货膨胀的最大危害是,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大范围转移,而且严重影响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能力。现代消费函数理论认为,财富是全社会总消费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公众持有的货币出现了严重的贬值,也意味着消费品的价格实际上是被严重低估了,有强烈的“比价复归”要求。所以,单纯地看待消费物价指数,并不能反映我国通货膨胀的全貌。而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只能反映当年国民经济增量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的错位,不能反映财富存量特别是各类资产价格的变化引起的财富效应。只有全国控制货币供给,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以及由此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机活动,才有可能根治通货膨胀。

目前,外汇储备持续大规模增加,有可能成为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被动局面的直接因素。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增加,有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因素,更多的是国际热钱流入的因素。在美元本位制的条件下,对人民币升值的套利活动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而我们缺乏最基本的控制手段,不能不说是宏观管理上的巨大缺失。在一些国际资本投机“落袋为安”的情况下,所谓取消“不必要的外汇管制”,鼓励“走出去”、“港股直通车”等,不过是应对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应急”之举,可能正好迎合了一些不良用心的国内外机构的梦想。尽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流动性,但同时给我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很重,要把全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切实把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努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这是值得我们期许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甄别公司“泡沫”不能以偏概全

倪小林

股市又到了一个鉴别涨跌原由和该与不该的十字路口,从周末开始,担心股市会在一系列的紧缩政策中漫无目标地滑下去的言论高调登场。在今年已经过去的十个月里,坚决主张挤压泡沫者与认为泡沫的阶段存在合理者几乎一直在较劲,最终因为股指过高,后者的声音在一个月内向销声匿迹。此次争议再现,只不过是股市下跌千点之后,市场又一次回头看的结果。

不久前股指攀升到6000点时,人们最大的担心是,泡沫何时破灭?非理性的投资热情何时回归理性?由此还产生了“崩溃论”,看似完全顺理成章。笔者近来查阅了相关股市泡沫问题的种种分析,发现了认为流动性过剩是主导因素外,其中最集中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公司是不是有如此高的收益让投资各方分享?也就是上市公司是不是存在很大的泡沫。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公司由于分享投资收益,热心资本运作会荒疏发展实业,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公司的投资收益比例过大,实业收益占比在减少,中国上市公司的泡沫严重。

笔者不否认目前在公司治理问题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即使中国公司有非理性行为,其产生原因在目前而言,源于体制改革不到位、创新环境与金融支持还存在一些制度障碍等等,这些带给企业的压力明显大于收益压力,而其中不少企业还不能完全按照企业规律经营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对于企业参与资本运作,甚至一些必要的交叉持股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把资本市场的精髓否定,而进一步强化人为配置资源的能力。

我们长期以来期望有一个反映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晴雨表”般的股市,有一个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的股市。目前,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也同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企业此时的资本运作肯定是较为频繁和经常的。最近,巴曙松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一个观点:学会与泡沫共舞。笔者认为他并不是在赞赏那些非理性的市场行为,而是在提示人们要看股市的泡沫背后与提升公司实力的关系。有市场人士对此分析为:对于中国企业,目前正是处在生产要素价值迅速提升的过程,生产要素的价值提升就必须通过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然后通过股市来反映。早在年初有人就提到对于流动性和泡沫问题要甄别,过度拥挤和放牧都不是宏观调控应有的方式。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来一些海外市场和机构和在评估中国股市的时候认为,目前市场资金缩水很大程度是因为银行收紧贷款,到明年年初银行正常贷款,情况将会有所改变。如果这个预计成为现实,是否还意味着我们在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里没有走出来?

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将是重点任务。而要完成这些任务,资本市场不但不能弱化,还需强化其功能,使之真正成为优化产业结构的纽带。眼下对待那些可以被甄别为泡沫严重的公司,我们应该从监管制度下手,而非把个别企业生搬硬套为所有上市公司的问题,最终影响市场整体判断,以至于不能对症下药。

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提几点建议

曹中铭

从中国石油到中国中铁,申购资金冻结规模越来越大,最终中签率越来越小,这映射出新股发行制度所存在的种种缺陷。

目前新股发行中最易引起非议的两个环节,一个是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另一个是网上公开发售,也就是资金申购制度。2005年1月1日,新股发行的询价制度开始施行。根据询价制的规定,询价对象如果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上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这客观上造成询价对象往往会报出高价,进而整体上提高了新股的发行价格。否则,询价对象将无缘网下配售的“利益蛋糕”。由于网下发行是比例配售,只要能参与则意味着可以分享新股收益,特别是在大牛市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网上公开发售之所以导致投资者的诟病,主要在于奉行的是“资金为王”的游戏规则。资金申购制度使中小投资者难得分食新股的一杯羹,因为他们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此种弱势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而大资金、大机构却将更多的新股筹码收入囊中,一旦遭遇行情不好,大资金、大机构却可以凭借着筹码集中优势、资金优势导致新股非理性高开,继而大举沽售手中的新股,而中小投资者无疑成为其中的埋单者,遭受着套牢之苦。况且,资金申



漫画 刘道伟

购制度还造就了市场上的一批“专业打新股”,对二级市场造成了明显的“抽血效应”。

资金申购制度弊端多多,原先的市值配售政策又不可行,新股到底应该怎样发行,确实考验着监管层的智慧。

对于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以及如何网上发行新股,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在发行价格上,管理层不妨规定新股发行市盈率的上下限,最好以不超过15倍为准(每股收益应按发行前一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新股发行市盈率则按照每股收益测算)。这将大大降

低询价机构询价时的盲目性与非理性,也将有利于降低新股的发行价格,避免询价机构随意报价的行为发生。

其次,降低向参与累计投标询价的询价对象配售股票的比例,以不超过发行总量的15%为宜,以使更多的新股进行网上公开发售,提高网上中签率。规定网下配售的机构不得参与网上发行,杜绝询价对象“脚踏两只船”两头受益的现象发生。当网下发行配售比例高于网上中签率时,启动回拨机制,至少要让更多者持平。此举有利于抑制询价机构的利益冲动,更多的新股收益将向中小散户转移。

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网上发行。建议改变当前资金申购的单一

模式,借鉴香港市场“一人X手”的发行方法,另外重新启用市值配售政策,从而形成两者并存互补的局面,但此“市值配售”绝非彼“市值配售”。具体操作方法如下:新股发行时,每持有沪深市场股票市值10000元,投资者进行申购后可以获取一个号码,但一个有效账户获取的号码最多不能超过10个,无论对于机构投资者、个人大户还是上市公司大股东都一视同仁。当类似中石油等大型企业发展新股时,保证每个参与申购的投资者或多或少都有份(如一人50股或100股),剩下的再通过摇号中签的方式决定。

此方法无疑能提高散户的中签率,抑制新股泡沫的产生,也将使“专业打新股”失去用武之地,但也有可能导致新股发行的失败。然而换个角度看,新股如果出现发行失败的状况,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发行方式,而是发行价格可能得不到市场的认同。反过来讲,又可以促使今后新股发行价格进一步走向合理。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农业用地因为不能交易,是无价值的,本质上是一种可以生产商品粮的“自然之物”,其价值实现必须通过土地征用或者拍卖才能转化成工业用地或者商业用地,但这种价值实现按照目前的土地制度已经与农民的利益无关,这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整体背景不合拍。农业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剩余价值的过程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今天国家已经有巨额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已经具备条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如果通过外汇储备促使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地区,将对缩小城乡差别进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特别贡献。

(作者系财经专栏作家)

■专栏

换思路:中国外汇储备的民生战略

要解决因为资本剩余迫使本币升值推动的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的上升问题,还得溯本清源,围绕土地稀缺、劳力剩余这个核心问题上考察……

李国旺

当前我国正处于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同时上升并正形成强烈通货膨胀预期的时期。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同时上升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流动性过剩是外汇储备超过了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外汇储备过度积聚又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成果和我国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它产生的负效应便是人民币升值开始成为世界范围的历史性事件。这一事件如果处理得好,将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强大经济基础,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在无形中消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种最坏的可能就是外汇储备处理不好成为流动性泛滥的源头并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金融领域实施“精确打击”的手段。

不能不加倍警惕的是,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其国家力量,开始形成欧美国家的共同意志,逼迫人民币升值,从而冲销“其对外贸易的赤字,他们通过国际垄

断资本掌握人民币升值的话语权,制造人民币快速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舆论压力。如果我们按国际投行的代表们的讲法去插手外汇管理或者投资,中国被国际垄断资本忽悠的可能性极大。

今年以来,为了抑制物价上升和经济过热的形成,央行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提高存款保证金率并发行央票以吸收流动性,但仍然无法解决不断涌出来的流动性,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客观的巨额外汇储备基础和西方国家利益几乎一致的压力。既然人民币升值是近三十年来在劳动力剩余和土地稀缺条件下解决资本极度短缺政策的自然结果,那么,要解决因为资本剩余迫使本币升值推动的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的上升问题,就得溯本清源,围绕土地稀缺、劳力剩余这个核心问题上考察。

从这个思路出发,对内我们不仅要继续通过货币政策抑制流动性,还要采取特殊的财政政策,提升民生福利,启动内需,从而通过社会保障的实现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人口红利与民生改善、人口红利与国力增强有机结合。

因此,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民生战略要从财政政策创新角度分两个层次来解决,即围绕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层次是解决人均耕地少的问题。基于对土地是稀缺资源的认识,我国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公有制,城市土地为国有,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在工业不发达的建国初期,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全面实行了户口制度,从而将城乡人口分割并固化。应当说,这套制度在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起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工业领域起飞而印度只能在很少占用土地资源的软件上起飞的内在经济原因。

但土地资源稀缺,特别是大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和高度垄断,为房地产价格出现脱离收入水平增长制造了理由。2000年后房地产逐渐成为投资者的主要选择,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城市土地稀缺的集体恐惧的压力必然会出现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住房销售价格完全可以脱离居民收入和房租

非理性地持续增长,由此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观,并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为此,国家财政,特别是在外汇管理上可以为建设廉租房做出贡献。因为外汇资产如果用于社会稳定,其作用将是更大的社会稳定效应,从而实现从公平向效益的转变。

因土地资源稀缺,形成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从而有了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不同层次的制度和价格。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农业用地因为不能交易,是无价值的,本质上是一种可以生产商品粮的“自然之物”,其价值实现必须通过土地征用或者拍卖才能转化成工业用地或者商业用地,但这种价值实现按照目前的土地制度已经与农民的利益无关,这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整体背景不合拍。农业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剩余价值的过程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今天国家已经有巨额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已经具备条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如果通过外汇储备促使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地区,将对缩小城乡差别进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特别贡献。

第二层次主要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向第二产业转移的问题,需要综

医改的每一步都应公开透明

魏也

虽然争论旷日持久的新医改方案仍未出台,但其配套政策已经相继推出。最近,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全国10家药品定点生产厂家,及第一批18种“定点处方药”的最高零售价。民众对于10家定点生产厂家的选择争议激烈。

我国的医疗改革已经进行了多次,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为什么?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于相关改革方案的酝酿、讨论、论证、决策等程序不透明,导致医疗改革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暗箱操作,这种状况很容易被相关既得利益者所操纵。

因此,此次医疗改革,必须接受之前的教训,每走一步都应该做到公开和透明,最大限度地避免暗箱操作。但是,从目前的进展来看,有关部门的做法并不令人乐观。以药品“定点生产”厂家的选择为例,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程序上的瑕疵。

其一,决策过程不透明。为什么选择这10家企业?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根据什么来评定?日后是否会有变动?外界一概不知,所有企业都由有关部门“钦点”。其二,选择的定点药品生产厂家太少。数据显示,截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国各药厂就已经达到6400家,在如此之多的药品生产企业中,仅选择其中的10家作为定点生产厂家服务于全国民众,显得过于集中。

药品“定点生产”厂家的选择,不仅牵涉到几千个药品生产企业的利益,更是牵涉到全国民众的利益,如果“定点生产”厂家的选择不公开,没有一个高度量化的具体标准,完全由有关部门根据自己的好恶作出决定,那么,就容易导致三个方面的弊端。其一,导致权力寻租,滋生出广造诟病的腐败——这也是我国医疗领域的一个顽疾。其二,由于选择公平性的丧失,对其他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其三,不利于药品价格的降低。

有关部门“钦点”“定点生产”厂家的做法,实际上等于在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上排挤了竞争。由于竞争局面难于形成,通过竞争降低药价的几率大大降低。虽然,有关部门可以自行对药品进行定价,防止药品偏离成本太远,但由于定点药厂数量少,实际上赋予了相关药品生产企业一定的垄断特权,一旦这些企业以成本上涨为由要求提高价格,有关部门是坚持还是妥协?如果妥协,只要有第一次妥协,就会有第二次;如果有关部门坚持己见,就可能发生药品短缺问题。如此一来,药品价格可能失控。

笔者担心,如果医疗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如此不透明的操作,一旦形成“惯例”,将给医疗改革方案的最终选择造成影响。

医疗改革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和民主,这是确保医疗改革得到民众支持并且符合我国国情的最重要前提。

仍以“定点生产”厂家的选择为例,即使定点生产,也必须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首先由有关部门制定出具体标准,然后,由相关企业根据这些标准参与竞争,然后再通过公开的程序,最好以民众投票与专家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选出合适的定点生产企业,这样,才能使药品企业的选择得到更多人的满意,也能避免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在药品生产企业选择中发挥“威力”。

并且,“定点生产”的药品也应该有一定的选择性,比如,对于短缺类药品或民众需求量大的药品定点生产等等。

医疗改革事关全国民众的福祉,有关部门在推出配套政策的时候,只有严格坚持十七大确立的基本原则,保持医疗改革决策的透明和民主,通过集思广益,才能使相关方案更加符合民众的期许。

(作者系华东师大研究生)

特别说明

评论版投稿信箱已经正式改为 plb@ssnews.com.cn,请各位作者继续惠寄稿件。请勿一稿两投。

(作者系资深证券研究人士)